感恩留在心中——别为捐献者立碑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北川在清理废墟时开始有意识地保持保留地震破坏原生态现场,为建博物馆作准备。博物馆怎么建呢?他们初步设想立两块大碑。一块刻上遇难者的姓名,另一块刻上此次地震灾难后全国的志愿者、支援者和捐赠者的姓名。

(5月28日《新京报》)

理解北川为什么要为支援者和捐赠者立碑,他们想以此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表示对救助的最高尊重。北川想以立碑这种最厚重、最难以磨灭的铭记方式告诉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北川是个会记恩感恩的地方,北川人不会忘记每一份爱心,这些铭刻在大理石上的名字将激励着北川人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这份念兹在兹的感恩之心让人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善良和忠厚,不过我想:人们的爱心是无私的,人们伸出援手时从没想过让北川记住自己,北川还是将这份感恩之情深深地留存在心中,不要为捐献者立碑。

一方面,爱心根本无法统计,姓名根本无法整理。志愿者和捐钱者的名字可能好统计一些,而以其他方式支援和捐赠的就难以统计了——比如,怎么记下那些献血者的姓名,怎么记下那些捐助物资者的姓名,怎么整理那些未通过官方渠道捐赠的姓名。爱心不分大小,每一份爱心都是平等的,每一份救助都同样值得铭记,如果要立碑就不能遗漏每一个名字每一份爱心。这种统计困难下,名字怎么刻呢?这么多名字在纪念碑上是写不尽的,而选择性地铭记对许多爱心是不敬的。

另一方面,这次捐赠中出现了很多不留姓名的捐助者,比如有夫妇署名"一滴水"向灾区捐款百万元,许多地方捐助活动的募捐簿上近四成签名都是"退休工人"、"无名氏"等匿名和化名,中华慈善总会截至16日收到的6亿元捐款中有四分之一是匿名捐款——多么善良的人啊,多少让人动容的爱心啊。捐赠榜上没有他们的名字,谁说他们不是世界上最有爱心的人;他们的爱心没有被人看到,但他们的爱到了最需要救助的人手中,谁说这种爱不是惊天动地的大爱。而这些名字这些大爱,是一个纪念碑难以包容的。

所以,如果真有感恩,还是把这份感恩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在心中为那些帮助过自己的人立一块碑吧。真正对捐助者的尊重,不是在大理石上留下他们的姓名,而是把所有的救灾捐赠花在明处,让每个捐助者能透明地看到自己的钱流到了需要救助的人手上;真正对捐助的感恩,不是用立碑留名表达,而是像唐山那样以实际行动感恩报恩——唐山没有为捐助者立碑,但经过那场灾难受到无数捐助后,每有其他城市其他地方发生灾难,唐山总是率先毫无保留地伸出援手,唐山人总会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爱心,唐山孤儿总会慷慨解囊,感恩已经深深地浸入这座城市每个人的血液中,这是最好的感恩。还有,如果真正感谢捐助者,那就把钱花在建设震不垮的房屋上,让幸存者生活在震不垮的房子中,让幸存的孩子们在震不倒的墙的护佑下。纪念碑再有价值,也许只有符号和形式上的纪念意义,而震不倒的墙则有实质性的价值。

地上无碑,心中有碑,尊重捐助者的每一分钱,铭记灾难教训,这是对捐助者最好的感恩。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第二落点

高效重建就是最好的感恩

我不是志愿者,因此不能代替他们说出对立碑一事的看法。不过,我是一个捐赠者,因此,我愿从一个普通捐赠者的角度,谈谈对立碑的看法。

慈善出自本心,并不求回报,所以我并不赞成将自己的名字刻上石碑以图百世流芳。当然我们有期望,把灾区建成美丽家园,这是志愿者、支援者和捐赠者最大的期望。如果一定要说到回报,这才是最好的回报。

石碑的意义在于永志以流传。援助救灾的人们,无非是听从了良心的召唤和人道的命令,没有人期待扬名或不朽。其实,除了立碑之外,灾区可以向支援者传达善意、表达谢意的方式很多。灾区应该通过及时透明的信息公开,让爱心善举始终运行在阳光之下。在宏大的爱心协力之下,灾区公职人员理当自勉与奋力,以清廉和高效的救灾重建工作,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尽早恢复美丽家园,这同样是外界的共同心愿。

与此番要为志愿者立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几日前发生在江油的公职人员打志愿者事件。有关方面迅速查明了事件真相,打人者也向志愿者道歉,并得到了当事人的谅解。或许志愿者千里迢迢奔赴灾区,只是为了尽其所能提供帮助,他们并无树碑立传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请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对于一些忙中之乱尤应体谅。这些,远远比立碑重要。

(周东飞)

■第三只眼

地震纪念馆应该缓建

对于那座规划全面的纪念馆,在我看来,至少目前着手建设也是很不合适的。因为建成那样一座纪念馆必然花费不菲,而大地震后的北川必须做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准备,建纪念馆实在远远没有建新家园重要。

被夷为平地的北川老县城,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地震博物馆,废墟之上的一切最能让人见证悲剧的残忍,也最能体现防震减灾的教育意义。而建一座刻有死者姓名的纪念碑,是为了镌刻对死者的永久缅怀,更是为了铭记对生命的无比尊重。除此之外,北川在当前实在没必要去建一个地震馆碑纪念群落。

在进行如此宏大的馆碑规划之前,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那就是:我们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可以是见证,是缅怀,是教育,但绝不应是旅游,是经济,乃至是政绩。如果一次以数万生命瞬间离去作为惨痛代价的大地震,却使得这里产生了一系列作为旅游景点和揽客名胜的地震馆碑,那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博物馆应该由政府控股,全部收入用于灾后重建和慈善事业"——在我看来,这样的规划理念,实际已经是对死者的一种大不敬了。它会使地震馆碑丧失反思与提醒的价值,而仅仅沦为一个展示苦难以赚取钞票的"人造景点"。

太多的事情等待着北川政府去做,而所有这些都要比为援助者树碑以及建大规模纪念馆重要得多。因为,让幸存者生活得更好,就是对死者最好的悼念,就是对援助者最好的感谢,就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

(舒圣祥)

地震时"教师先逃"不合生存秩序和责任伦理

【中国日记之童大焕专栏】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有很多舍身护学生的教师,很多拼了命干到昏厥的救援者,还有眼看着别人救自己太危险而吞金割腕自杀舍生取义的妇人……

但废墟下也有人高呼:"救救我,我是张书记";也有人面对和自己在一起的同学,对救援人员说:"先救我吧,我成绩考第一。"教师范美忠更因地震时未提醒学生而自顾逃跑而"声名鹊起"。

范美忠对一位对他感到失望的学生说道:"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危险,我不管你们也没有危险,何况你们是十七八岁的人了!"这番地震后的"表白"在天涯论坛掀起轩然大波,不少网友认为,地震了老师先跑是一种本能。但范美忠还要"洋洋自得"地自我表白,毕竟是件异常傻的事情。

更有羽戈先生撰文《泛道德主义也是一场灾难》为其辩护,认为"范老师是以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之行动,来表达、捍卫人类的生存底线。""常态社会却是以范老师这种自私、而且敢于承认自己自私的人类为基石,制度建构亦然。正视范老师的存在,并学会理解他的行为,是我们迈向法律至上的公民社会的一道坎。""在另一面,那些陷入泛道德主义虚妄激情的网络暴民表现得一如既往糟糕透顶。泛道德主义对我们而言,何尝不也是一场灾难?"

这种貌似先进、自由的"理论",真是远远不如那位舍生取义的妇人之见。

人类和动物世界,在漫长的、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形成了一套生存秩序和责任伦理。动物尚且知道危险来临时强者要先保护弱者,何况人乎?每当危险和灾难来临时,首先冲出去抵抗危险的总是人群中的强者,狭窄的生命通道总是首先留给妇女和儿童。这就是人类基本的生存秩序和道义要求。克拉玛依大火之所以成为国人心中的一道巨创,就是因为违背了这样的生存秩序和生命伦理,一句"让领导先行" 成为永远的耻辱和伤疤。如果按照范美忠和羽戈先生文章的逻辑,灾后救人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无数救人者也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

而在生命伦理之外,还有责任伦理。无论中外,教师在校期间都有保护学生安全的责任,这是职责所系,也是职业规定。教师在地震来临时抛下学生,第一时间自己跑掉,跟船长看见前面有冰山却来不及躲避时第一个拿走救生圈逃跑一样,反正能逃一个是一个!想想后果会如何?灾难来临时,公职人员、军人、警察,不需要命令,必须首先冲在第一线。此时就不需要任何命令,灾情就是命令。这也是职业伦理,这种职业伦理甚至超越了生命伦理——比如说商场失火,飞机在空中突现危机等等,那些服务人员往往都是女性,在一般的生命伦理中,她们有权利先逃,但是由于她们有职责在身,她们对环境和专业熟悉,首先应当承担起安全疏导使命的,就是她们无疑!这时候,她们成了最后撤离的人群。

范美忠先生以及为其辩护的人们,请仔细再想一想。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敬礼娃娃"的心理障碍该让舆论脸红

■今日视点

连日来,曾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敬礼娃娃"郎铮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不仅有众多媒体赶到西安探访正在治疗的小郎铮,有很多名人在郎铮的照片上签名送给他留念,而且还有众多网友力挺小郎铮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在鸟巢点燃主火炬,以此"既表明汶川不会塌下,因为他被祖国和人民稳稳托起。也表明汶川不会消亡,在十三亿中华民族这个巨人肩头,点燃新生的火焰!"

(5月28日《竞报》)

就在很多人陷入"敬礼娃娃热"不能自拔的时候,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却传了过来。据报道,正在西安治疗的小郎铮出现了心理障碍,唐都医院的心理医生刘睿说,目前郎铮老是想房子垮塌的情景。郎铮不喜欢说话,很恐惧,不愿离开母亲、不愿接触陌生人。郎铮来到西安后,很多人前往看望他,导致他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也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对他的情绪也有一定影响。刘睿因此呼吁:希望关心郎铮的市民不要再来探望他,给他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

在医生面前,郎铮先是一个普通的需要静养的小病人,然后才是闻名全国的"敬礼娃娃",但在舆论面前,这个很正常的秩序却似乎被颠倒了过来——郎铮先是应该配合舆论的小名人,然后才是一个正在疗伤的孩子。我不知道当小郎铮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了媒体千篇一律的提问,他会不会感到厌烦?我不知道整天被舆论聚焦的小郎铮,希不希望自己能多一点时间听妈妈讲故事,跟小朋友们做游戏?才几岁大的小郎铮,他又懂不懂得担任最后一棒火炬手点燃主火炬的重大意义?答案并不难得出,毕竟,郎铮只是一个几岁大的孩子。在被救出废墟的那一刻,他出于儿童的淳朴感恩之心和一丝丝调皮,敬了那个感动中国的队礼。我们被这个废墟上的敬礼感动了,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生的勇气,这就够了,何必一次次地追问这个几岁大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敬礼?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又何必时时刻刻把这个小男孩放在聚光灯下反复打量?

相对于一个才几岁大的孩子来说,舆论是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对于才几岁大的小郎铮来说,他现在只是希望在家人的陪伴下尽快忘却那恐怖的一幕,尽快忘却倒塌的房子、逝去的玩伴,尽快回到平静的生活中去。但处于强势地位的舆论,却一次次通过千篇一律的提问,甚至通过"最后一棒火炬手"的巨大荣誉将这个孩子拖入到回忆那段残酷记忆的恐惧中去。这样强加于人的过度聚焦,说是一种舆论暴力,似乎并不为过。

现在,曾经感动中国的小郎铮已经因为舆论的过度关注出现了心理障碍,网上居然还有人说这个小孩不够坚强,何等残忍?够了,小郎铮只是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他只是希望能够安静地走出灾难阴影,只是希望像其他孩子一样平静地生活,我们就不要再让聚光灯长时间停留在这个孩子已经惊恐的脸上了。

(本报评论员 赵勇)

■相关评论

给受灾孩子一个平静的"六一"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难保灾区孩子不会成为更多媒体和市民关注的焦点,如何让这些孩子尽可能地少受干扰,过一个没有眼泪、平静快乐的儿童节,需要每位热心人三思而后行。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真正关爱这些孩子,其实只需做到两点就够了:其一、最大程度地配合心理专家,加强对这些地震儿童的心理干预和辅导,帮助他们与外界自然沟通,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爱和帮助,早日走出心理孤独和地震阴影;其二、尽可能不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去打扰他们,尤其是六一儿童节期间,要确保他们能够独立平静地过自己的节日。这种时候,不把自以为是的关爱强加给他们,就是对他们最大的关爱。

前几天,教育部曾提出要坚决杜绝媒体反复采访同一名受灾学生。原因就是如此,不同的记者或不同的热心单位反复要求去见同一个学生,让他们诉说自己的经历和痛苦过程,有些记者甚至反复追问他们"伤在哪儿,疼不疼,有多疼",如此伪关爱只会增加他们内心的伤痛和无助。六一儿童节期间,我们更应该杜绝这些行为,尤其要避免以关爱地震儿童的节日生活为名,让他们比较灾难前后的生活状况等等。

(刘克军)

不必对"汶川电影"有过多担心

■热点纵论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灾难形影不离。与其说人类在征服自然中不断强大,不如说灾难锻铸了人类生存的法则和能力。既然灾难无法摆脱,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正视并学会"热爱"它。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在正视灾魔上交出了一份成熟的答卷:没有隐瞒灾情,没有回避伤亡数字,甚至,也没有刻意淡化撕心裂肺的抢救场景和几乎夷为平地的城镇惨况。正因为此,四川震灾才迅速在国人心中凝聚成一种愈挫愈浓的爱国心,赈灾重建的步伐才得以快速前行,同时,国际社会才会空前地对中国表现出同情和敬佩。

对本次灾难的审视,以它对国人的震撼程度,对国民素质的检验力度,对人性、生命的思考深度,对整个社会组织所应承担的责任和所表现出来的执政效能的反映广度,都应该通过特定的载体记录下来。灾难是一种创伤也是一种财富,大灾难是大的磨难同时也是大的宝库。汶川大地震给中国人上了特殊一课,吞咽和消化地震带来的血色启迪,可能将持续几代人,那么,有什么理由对"汶川电影""汶川报告文学" 的接踵而至说不呢?

用文学艺术手段表现灾难、反映人性是反思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灵丹妙药,它既可以通过科学幻想揭示人类危机达到警醒目的,如大片《后天》;也可以通过灾难纪实展现人性本质引起社会共鸣、唤起普世爱心,如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9·11发生后,美国关于此事件的艺术和纪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担心地震电影纷纷上马会造成第二波心理伤害、因沉淀性不够失之肤浅的议论,尽管不无道理,但它流露出的对灾难的敏感状态、对人类如何在灾难之后浴血疗伤的坚韧性缺乏信心,仍然是深陷在传统的灾难观中的。

直面灾难,"热爱"灾难,是一个心理学命题,更重要的,是它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正本清源。

(西风)

投稿电邮: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